

序章

日本近代新聞事業與  
香港報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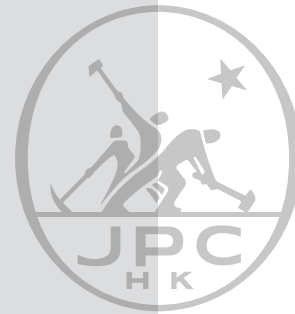


## 第一節 引言

鴉片戰爭後，中英兩國於 1842 年簽訂《南京條約》，清政府把香港島「割讓」給英國時，日本仍處於德川幕府（1603—1867）的「鎖國」政策之下。1853 年，美國海軍提督培理（Matthew C. Perry, 1794—1858）率領軍艦到日本「叩關」，翌年日本「開國」，從此積極開展對外事務。與當時的中國不同，日本對於世界形勢和亞洲政局採取關心態度，主動搜集海外資訊和西洋知識。香港在 19 世紀中葉已是亞洲地區最早發展起來的城市之一，華洋雜處，圖書報刊出版事業漸趨蓬勃，成為日本吸收新知的一大來源，因此很快便與香港報業結下因緣，影響甚為深遠。

早在德川幕府末年，日本當局已致力搜集香港出版的報刊，加以傳抄，甚至翻刻和翻譯。到了明治時期（1868—1912），香港出版的書刊，包括報紙、課本和辭典，仍然備受日本重視；創辦《循環日報》的香港著名報人王韜（1828—1897），且應日本《報知新聞》之邀訪問日本達 4 個月之久。19 世紀末、20 世紀初，日本人開始在香港創辦中文及日文報刊；其後《香港日報》同時出版中文版、日文版和英文版，成為香港報業史上僅見的三語報紙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，日本人仍一直重視香港的資訊傳播地位，除了在香港創辦介紹日本事物的中文期刊外，又出版了幾種供日本僑民閱讀的日文報刊。上述這些事例足以說明一個事實，就是日本人自幕末以來，中經明治時期、大正時期（1912—1926）、昭和時期（1926—1989）以至平成時期（1989—2019），日本人與香港報業是頗有淵源的，香港網絡是日本朝野人士收集中國消息、亞太資訊及世界輿論的重要渠道之一。



與此相反，香港各界人士雖然對日本流行事物和飲食文化等十分熱衷，而於日本報業和出版情況則所知甚少，更遑論有所參與。本章擬據零星的文獻和記載闡明戰前和戰時（香港淪陷時期）日本人與香港報業的關係，並以此為脈絡，釐清學界的推斷，冀能為港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填補一些空白。

## 第二節 幕末日本人與香港報業

1853年8月，香港英華書院創辦《遐邇貫珍》（*Chinese Serials*），是本地最早的中文刊物，也是鴉片戰爭後第一份在華人社會出現的中文報刊，出版至1856年5月停辦，歷時近3年之久，共有33期（號）。每期12頁至24頁，印3千冊，除香港外，還在廣州、廈門、福州、寧波、上海等地銷售和贈閱。該刊內容多為專題論說，包括天文、歷史、科學、醫學、宗教、商務等；還設有近日雜報欄，記載香港和中外大事。<sup>1</sup>必須指出的是，定期為中國人提供近代新知和世界消息，在當時的香港以至中國，是十分可貴的。<sup>2</sup>

1853年7月，日本從荷蘭船上知道太平軍佔領南京的消息；同年12月，到琉球出差的鹿兒島藩士鄉田仲兵衛、川上式部，從那霸港的美艦上得到兩冊《遐邇貫珍》，裏面有太平軍佔領南京和香港總督兼英國全權公使文翰（港譯般含；Sir Samuel George Bonham, 1803—1863）訪問南京的報導。翌年1月，他們即把該刊連同打聽到的關於太平軍的情報（如信奉基督教）一起送往幕府。自此之後，《遐邇貫珍》即受到日本外交官和有識之士的器重，例如著名思想家吉田松陰（1830—1859）讀了第1號上所載的〈伊娑菩喻言〉（即伊索寓言），便曾寫過一篇跋。<sup>3</sup>



吉田松陰是明治維新的先驅者，高杉晉作（1839—1867）、木戶孝允（1833—1877）、山縣有朋（1839—1922）、井上馨（1835—1915）、伊藤博文（1841—1909）等傑出人物都是他的學生。

在這前後，發生了一件轟動日本的大事。1853年7月，美國海軍提督培理率領艦隊抵達江戶灣的浦賀，要求日本開國，聲稱明年再來，隨後艦隊駛到香港駐泊。培理艦隊再度起程赴日時，還帶同香港一個叫羅森（向喬，1821？—1899）的廣東人充當漢文翻譯。羅森目睹美日談判及簽約的經過，並遊覽了橫濱、下田、箱館等地，「香港人」最早踏足長崎以外的日本國土，實在非他莫屬。當年8月羅森返港後，把他的見聞寫成〈日本日記〉，分3次刊登在《遐邇貫珍》上。<sup>4</sup>〈日本日記〉是記載日本開國史事的重要著作，其後在日本有輯印本出版。<sup>5</sup>至於《遐邇貫珍》，在日本有寫本流傳。<sup>6</sup>

羅森在日本期間，曾與不少官員接觸，通過筆談向他們介紹了太平天國的情況，還把自己的有關著述借給他們抄錄。以後日本即出現了幾種題為《南京記事》的抄本，又有木活字改訂本《滿清記事》的刊行。<sup>7</sup>

日本開國後，官民漸多出外遊歷，例如日本遣美使節團出發和回程時，曾於1860年及1862年過港，兩次都逗留一星期左右，除了到處參觀和購買書籍外，還到日本人慕名已久的英華書院會見傳教士理雅各（James Legge, 1814—1897）等，又與羅森見面。<sup>8</sup>使節團的一個成員福澤諭吉（1835—1901），回國後便撰寫《西洋事情》等書，成為鼎鼎大名的啟蒙思想家。傳說明治天皇（睦仁，1852—1912；1867—1912年在位）登基後，曾聘羅森為顧問，但其事不見於日本官方記載，未知是否屬實。

1860年代，日本流行翻刻中文報刊，如上海的《六合叢談》、寧波的《中外新聞》和香港的《香港新聞》等，而且冠以「官版」字樣。<sup>9</sup>

一般認為，《香港新聞》是日本據《香港船頭貨價紙》翻印而成的，創於1861年，有日文註解。《香港船頭貨價紙》創於1857年，是香港第一張中文報紙，由英文《孖刺報》（*The Daily Press*）報館印刷發行，因此被視為該報的副刊。每週出版3次，單張兩面印刷，一版為船期物價，另一版為新聞。<sup>10</sup>該報於1865年間擴充版面，改名為《香港中外新報》。但事實是否如此，仍有商榷餘地。

### 第三節 王韜與港日文化交流

王韜是近代中國著名文士，亦是洋務運動時期重要的思想家，早年活動於上海，1849年進入英國傳教士麥都思（Walter Henry Medhurst, 1796—1857）所辦的墨海書館，參加編校工作，達13年之久。1862年間，因化名「黃畹」上書太平天國而遭清政府通緝，避地香港，協助英華書院院長理雅各翻譯中國經書，曾遊歷英、法、俄等歐洲國家。1871年歐洲爆發普法戰爭，戰爭結束後不久，王韜在聖保羅書院學生的協助下，編撰了《普法戰紀》14卷，敘述和分析戰爭的原因、經過和結果，並對戰後國際形勢的變化作了預測，成為近代中國第一本世界史著作。此書出版後，王韜聲名大增，《普法戰紀》旋即傳到日本，引起很大的反響。<sup>11</sup>其後日本陸軍省命人句讀此書，重新排印，現時所見的大阪日本陸軍文庫校印本，是1885年（明治二十年）的版本。

1874年，王韜在香港創辦《循環日報》，每日發表論說1篇，宣揚變法自強等主張，開近代中國政論報紙的先河，這些政論連同他在其他報刊上發表的文章，後來結集而成《弢園文錄外編》於1883年出版。其間有一件重要的事，就是王韜在日本《報知新聞》栗本鋤雲



（1822—1897）等人邀請下，1879年到日本訪問，歷時4個月，受到日本文學者及政界人物的歡迎，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，盛況空前。他把此次行程經過寫成《扶桑日記》3卷，由栗本鋤雲訓點，日本東京報知社出版，於當年冬至次年夏出齊。王韜返回香港後，仍與日本友人保持通信聯繫。<sup>12</sup>

日本早從幕末時起便注意香港出版的書刊，已如前述。1873年（明治六年），日本設立駐香港領事館，另有日本雜貨店在中環開業，港日關係正式開展。香港書報在此之前對日本所起的啟蒙作用，使日本人更放眼世界，決心走上近代化之路，促成明治維新，足以說明幕末至明治初年這個關鍵時刻，港日之間的文化交流實在不是無足輕重的。當時日本官方考察團和知識人士經過香港，除拜訪本地知名人士外，通常都慕名到英華書院參觀，以及購買書籍。他們很多時在香港所接觸到的事物，或多或少對他們都會產生啟發性的意義。<sup>13</sup>

王韜訪問日本，是港日文化關係的一個里程碑，但也宣告了一個階段的結束，此後日本已不再如前此般重視香港出版的書刊了。不過，直至1880年代中期，王韜離港返滬後，還有一些日本知識人士如矢野文雄（1850—1931）等到香港擬訪晤王韜。<sup>14</sup>1889年（明治二十二年）《大日本帝國憲法》（通稱《明治憲法》）頒佈前後，日本在民族主義的大前提下，保守的國家主義、國粹主義相繼抬頭，民間且掀起了一股「反歐化主義」的浪潮。這個時代，尤其是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後，是日本走向軍國主義、帝國主義的一個過渡時期，港日兩地的關係亦隨之而有所調整，香港書刊在日本的重要性減低，從這一點看來，便不是偶然的了。

#### 第四節 日本人在香港創辦的報刊

早於明治末年，日本人在香港已創辦了兩種報紙。第一種是中文的《東報》，創於1899年，張少春、張鶴臣為督印人，具體情況不詳。第二種是日文的《香港日報》，1909年9月1日由松島宗衛（1871—1935）所創，估計當時《東報》已經停刊，所以《香港日報》是日本人在香港唯一的言論機關，而且持續刊行了三十多年，對象主要是本地的日本僑民。松島宗衛主持該報12年，其後情況不詳，至1935年10月12日，由井手元一繼任社長。1937年12月起，該報的第4版改為中文；次年6月，獨立成為中文的《香港日報》。1938年11月1日，井手元一因年事已高，辭去職務，由衛藤俊彥繼任為社長。1939年6月，另出英文週刊《香港新聞》（*The Hongkong News*）。《香港日報》至此同時出版日文版、中文版和英文版，成為香港報業史上唯一的三語報紙。這個發展足以表明，當時日本人在香港辦報，已超越了服務日僑的初衷，而是希望傳達日本訊息給香港華人，以及當時在港的西方人士，日本人企圖染指香港事務的野心已是昭然若揭了。

大正時期的日本人，也有在港創辦報紙的紀錄。1921年6月17日，平井真澄創辦日文日報《南支那新報》。翌年，平井真澄往廣州辦《廣州日報》，《南支那新報》遂告停刊。另有一說，謂《南支那新報》刊行約兩年半，至1923年9月，日本發生關東大地震後停刊。具體事實如何，仍有待考證。

1941年年底，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。12月8日，日軍突襲香港；同月25日，香港總督楊慕琦（Mark Young, 1886—1974）向日軍投降，香港淪陷，進入「日佔時期」。至1945年8月15日，日軍投降，香港度過了「三年零八個月」的黑暗歲月，其間香港報業處於慘淡經營狀況。



太平洋戰爭爆發時，《香港日報》被香港當局查封；首腦人物亦被逮捕監禁，曾短暫停刊，此舉是恐怕日本人的言論影響時局；日軍佔領香港後，該報始恢復出版，其性質有如「官方刊物」，成為香港淪陷時期最重要的報紙，從中可以看到日本統治香港的主要措施，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當時香港的社會民生狀況。英文的《香港新聞》（*The Hongkong News*）且由週報改為日報，以西方人士及不懂中文的華僑為主要對象。當時還有一份日文雙月刊，叫做《寫真情報》，是日本佔領當局報導部宣傳班所辦，相信是以本地的日本軍政人員為主要對象。

香港淪陷初期，共有11家中文報紙得以出版，包括《南華日報》、《天演日報》、《自由日報》、《華僑日報》、《華字日報》、《循環日報》、《星島日報》、《大眾日報》、《大光報》、《新晚報》和《香港日報》，後者另有日文版和英文版。除了日本人所辦的《香港日報》和汪精衛政權在香港所辦的親日報紙《南華日報》外，其他報紙都要被迫與日本佔領軍合作；1942年2月20日，日本宣佈香港為佔領地，任命陸軍中將磯谷廉介（1886—1967）為佔領地總督，所有報紙和新聞消息均受香港佔領地總督部的報導部統制。

其後日本佔領軍政府以白報紙供應不足為由，逼迫各家報紙於1942年6月1日起合併，《華僑日報》與《大眾日報》合併，仍稱《華僑日報》；《華字日報》與《星島日報》合併，改名《香島日報》；《循環日報》與《大光報》合併，成為《東亞晚報》；《南華日報》繼續出版，《自由日報》、《天演日報》、《新晚報》均併入該報；至於《香港日報》，則維持中文、日文、英文三種語文版本。換言之，淪陷時期的香港，後期只有《華僑日報》、《香島日報》、《東亞晚報》、《南華日報》、《香港日報》5種中文報紙繼續出版。<sup>15</sup>到了1944年8月22日，情況更加惡劣，香港各報開始調整版面，減少內容，由原來的一大張改為半張；《東亞晚報》支



撐了半年，維持不下去，於 1945 年 3 月停刊，《華僑日報》因而由 4 月創辦《華僑晚報》，刊行至 1988 年停辦。<sup>16</sup>

1945 年 8 月 15 日，日本宣佈投降；8 月 30 日，英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夏慤少將（H. J. Harcourt, 1892 — 1959）率艦抵港，從日軍手中接收香港。戰爭結束後，親日報紙紛紛停刊，近代日本人在香港的辦報活動，至此宣告結束。戰後日本人仍然在港有出版日文報刊，主要是為居港日僑服務，為他們提供一些本地和中國消息，以及與工商貿易有關的報導；此外，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於 1968 年創辦《新日本月刊》（其後改為雙月刊），登載介紹日本的文章和相關活動消息，還有學習日語的專欄等。創辦報刊的宗旨和登載的內容，已與戰前大大不同了。



## 註釋

- 1 參閱李志剛〈早期教士在港創辦第一份中文報刊——《遐邇貫珍》〉，氏著《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》（台北：宇宙光出版社，1989 年），頁 135 — 143。
- 2 周佳榮〈十九世紀香港書刊在日本的傳播〉，《歷史與文化》第 2 期（2001 年），頁 80。
- 3 參閱增田涉《西学東漸と中国事情》（東京：岩波書店，1979 年），頁 28。
- 4 羅森的〈日本日記〉，刊於《遐邇貫珍》1854 年第 11 號、12 號及 1855 年第 1 號。
- 5 王曉秋、史鵬校《早期日本遊記五種》（長沙：湖南人民出版社，1983 年）所錄羅森〈日本日記〉，便是根據日本小島晉治教授提供的輯印本排印，其書題為《米國使節隨行清國人羅森日記》，題後並有一小註，略云：「《遐邇貫珍》原本不易獲得，此係據向山篤《蠹餘一得》及中村《不能齋筆記》所錄重印。」
- 6 參閱卓南生《中國近代新聞成立史（1815 — 1874）》（東京：ベリかん社，1990 年），頁 98。

- 7 有關羅森的生平，可參羅香林〈香港開埠初期文教工作者羅向喬事蹟述釋〉，《包遵彭先生紀念論文集》（台北：國立歷史博物館、國立中央圖書館；美國：聖若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聯合編印，1971 年），頁 289 — 293。亦可參羅晃潮〈近代唯一目睹日本「開國」的中國人：羅向喬及其《日本日記》〉，氏著《扶桑覓僑蹤》（廣州：暨南大學出版社，1994 年），頁 147 — 151。關於《滿清紀事》，可參增田涉前引書，頁 280 — 320。周俊基〈見證日本開國的首位中國人——羅森研究資料綜述〉，《日本與亞太研究》第 2 卷 1 期（2018 年 1 月），頁 67 — 86，搜羅相關資料甚詳。
- 8 參閱陳湛頤《日本人與香港：十九世紀見聞錄》（香港：香港教育圖書公司，1995 年），頁 99 — 105；並參閱任文正〈十九世紀港日交通往來述略〉，譚汝謙編《港日關係之回顧與前瞻：香港日本文化協會二十五週年特集》（香港：香港日本文化協會，1988 年），頁 108。
- 9 參閱增田涉前引書，頁 18。
- 10 參閱史和、姚福申、葉翠娣編《中國近代報刊名錄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91 年），頁 262 — 263。
- 11 參閱王曉秋《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2 年），頁 215 — 216；析平《王韜評傳》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90 年），頁 172 — 173。
- 12 參閱周佳榮〈在香港與王韜會面：中日兩國名士訪港記錄〉，林啟彥、黃文江主編《王韜與近代世界》（香港：香港教育圖書公司，2000 年），頁 391。
- 13 舉例來說，明治時期著名的宗教家及同志社大學創辦人新島襄（1843 — 1890），在幕末時於 1864 年（元治元年）秘密赴美國攻讀神學，途經香港，初次見到漢譯的基督教《聖經》，致使他日後在這方面加以著意。
- 14 同註 12，頁 392 — 393。
- 15 鄭鏡明〈香港報業斷代史：香港淪陷時期的中文報業〉，《明報月刊》第 23 卷 10 期（1988 年 10 月），頁 105 — 106。
- 16 周佳榮《香港報刊與大眾傳播》（香港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，2017 年），頁 168。

# 近代日本出版文化與 中文報刊的發展

